

战国文字通论

何琳儀 著

中華書局

何琳儀 著

戰國文字通論

中華書局

戰國文字通論

何琳儀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19 1/2 印張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900冊 定價：19.50元

ISBN 7—101—00553—5/H · 47

序言

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敘，描述戰國時期，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滯，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清段玉裁注云，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即「各用其方俗語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語異聲則音韵歧，文字異形則體製惑，車同軌，書同文之盛於是乎變矣」。按子思著《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春秋晚期文字尚能維持大體一致，至戰國時歧異始形顯著，為一大變。秦兼併六國，以秦文字為標準，「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為一大變。由此看來，戰國文字在中國文字演變史上自成段落，應當專門加以研究。

北宋以來學者重視青銅器銘文，所指主要是商代晚期至春秋的文字。清末甲骨文發現，商代文字研究更為興盛。戰國文字，由於材料繁多分散，且少長篇鉅製，歷來不為學者所重；加以戰國文字有其本身種種特點，雖有著作涉及，每每難於掌握其間規律，在釋讀上造成許多誤解，以訛傳訛，歷久不改。這不僅影響着對文字演變的通盤了解，而且對古代歷史文化的探索也有不小妨礙。戰國文字作為系統研究的對象，是在五十年代開始的，二十多年間發展迅速，迄今已形成中國古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分支。

戰國文字研究發展的標誌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已經有了一批專心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各屆年會都有戰國文字研究的論文提出。在研究生培養上，也有了以戰國文字研究作為專業方向或者論文主題的。隨着近年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新的戰國文字材料大量出現，實際工作迫切要求有關研究成果的傳布普及。從各方面看，對戰國文字研究的豐富收穫進行總結綜合，現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何琳儀同志這部《戰國文字通論》正好滿足了大家的希望和要求。

何琳儀同志從學於古文字學界前輩于省吾先生，取得學位後，在吉林大學講授戰國文字。他在古文字學有深厚基礎，因而論述戰國文字，能由古文字流變全局着眼。《通論》一書有兩點優長，是特別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第一，是博採眾說，去取矜慎。如前所言，戰國文字材料本多瑣碎，考釋論著為數頗多，兩者都不便蒐集，讀者苦於難觀其全。《通論》篇幅雖屬有限，但已將各家成說儘可能搜羅在內，予以系統化。

書中特別注意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一些剛剛發表的，也已收入融會。

吸收已有成果，貴在有所別擇。任何學科，尤其是像戰國文字研究這樣成形不久，正處在發展時期的分支學科，學者間難免有若干爭論，新說也必然有不能成立者。本書不狃於舊說，亦不惑於新義。例如幾年前我曾寫一小文，論及上海博物館收藏有江陵地名的戰國官璽，何琳儀同志取文中釋地部分，而芟除所釋未妥部分，甚為允當，值得感謝。

第二，是推陳出新，多有創見。本書雖然是一部《通論》，首先側重於綜述，而各章節中實含有作者精心研討的新獲，不少即在舉例之間，請讀者不要忽視。以下試選數例，聊見一斑。

燕國長條形璽，多有「」字，前人多置不釋。或釋為「」，讀為節，亦嫌未妥。《通論》由于省吾先生釋甲骨文「」字出發，釋此字為「」，讀為符，是新穎的見解。此例一。

趙國相邦春平侯等鉞，刻銘有時有「左右伐器」之詞，舊多不識，或識之而不知所云。《通論》引《楚辭·天問》及注，指出「伐器」猶言兵器，解決了這一疑難。此例二。

江蘇盱眙南窑莊出土銅壺，曾經幾位學者討論，銘文釋讀逐漸明晰。其中有「重金某某」四字，後兩字舊釋「縮壺」，壺字之釋，是由於認為該字是器名，實不妥當。《通論》改釋為「絡襄」，可讀為「絡襄」，與此器有鏤空銅絲網套及錯金、鑲嵌綠松石吻合。此例三。

河北平山出土中山王方壺，銘文有「」，即絕字，字從刀作。《通論》引孔廣居《說文疑疑》說，指出前人預見這一點。此例四。

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楚簡，有「相」附如會，相保如介之語。《通論》說明附、會、保、介意義相關，如為連詞。按《大戴禮記·文王宮人篇》「志殷如浚（深）」，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如字用法正與此同。此例五。

這五個例子不過是隨手拈來，書中還有許多新見解。各章所論戰國文字變化規律，更是富於啟示性，對讀者有很大幫助。

《戰國文字通論》的出版，在這一分支學科的成長過程中，是一件大事，必將促進學科的深入發展，有利於中國古文字學的進步。蒙琳儀同志叫我寫幾句話，我是極感欣幸的。所說容有不當，請琳儀同志和大家指正。

李學勤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目錄

第一章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一
第一節 引言	一
第二節 古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二
第三節 近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七
第四節 現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一一
第五節 戰國文字的分類	一六
第六節 小結	二五
第二章 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	三四
第一節 引言	三四
第二節 籀文	三四
第三節 《說文》古文	四〇
第四節 三體石經古文	五一
第五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古文	六〇
第六節 小結	七〇
第三章 戰國文字分域概述	七七
第一節 引言	七七
第二節 齊系文字	七八
第三節 燕系文字	九二
第四節 晉系文字	一〇四
第五節 楚系文字	一三五
第六節 秦系文字	一五五

第七節	小結	一六九
第四章	戰國文字形體演變	一八四
第一節	引言	一八四
第二節	簡化	一八五
第三節	繁化	一九四
第四節	異化	二〇三
第五節	同化	二二〇
第六節	特殊符號	二二四
第七節	小結	二三四
第五章	戰國文字釋讀方法	二四三
第一節	引言	二四三
第二節	歷史比較	二四七
第三節	異域比較	二五〇
第四節	同域比較	二五六
第五節	古文比較	二六〇
第六節	諧聲比較	二六五
第七節	音義相諧	二六九
第八節	辭例推勘	二七四
第九節	語法分析	二七九
第十節	小結	二八二
餘論		二九〇
後記		二九六
引用書刊簡稱表		二九七

第一章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第一節 引言

漢語古文字，顧名思義是指記錄上古漢語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內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學者主張漢武帝以前的古隸也屬於古文字範疇）。近幾十年來，古文字學界都傾向於把漢語古文字分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戰國文字三部分。我們認為，這種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夠反映三段歷史時期的文字發展演變過程。

戰國文字是漢語古文字的晚期書寫形式。從字體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筆畫圓轉的篆書，也包括筆畫方折的古隸；從書寫材料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金屬、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絲織品。僅就外在形式觀察，戰國文字就是一相當複雜的概念。因此，在介紹這種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須搞清它的範疇。戰國時期的下限，公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年，即公元前二二一年。戰國時期的上限則有公元前四八一年（上接《春秋》終年）、公元前四七五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周貞定王元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三家始封諸侯）等異說^①。

戰國文字的使用時間，一般說來應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相對應。然而，不同時期古文字的分期決不能如歷史年表那樣整齊劃一（何況上舉戰國始年已在近八十年間浮動），其形體也決不會因改朝換代而發生突變。文字的變異總是按照自身的演進規律而發展變化。一般說來，這種發展變化都要經歷一段較長的漸變過程。殷代文字演變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變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變為戰國文字，都有其歷史、地域、人為諸方面的複雜因素。很難設想，一種古文字在某天早晨會變成另一種古文字，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取中央集權的威力，罷黜六國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場雷厲風行的文字革命，堪稱文字學史上僅見的文字「突變」。儘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開始使用的時間定為公元前二二一年。因為，前此不久秦國已出現了象新鄭虎符那樣標準的小篆^②。而後此幾十年的秦漢竹簡帛書文字中也時

常可以找到六國古文的影子^③。因此，機械地劃分戰國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夠妥當的。

其實，自春秋中期以來，列國文字已開始發生引人注目的變異，其形體結構和書寫風格都逐漸失去了西周文字的特點，而開啟了戰國前期文字的先河。如：晉國樂書缶「丑」作「𠂔」，「𠂔」亦見江陵竹簡；「𠂔」作「𠂔」，「𠂔」亦見長沙帛書；齊國叔夷罇「屯」作「𠂔」，「𠂔」亦見陳純釜；「察」作「𠂔」，「𠂔」亦見長沙帛書等。至于春秋中期的王子嬰次鑪、王子申盞孟等銘文與戰國早期禽璋諸器、曾侯乙諸器等銘文的風格類似，更是一目瞭然。至于南方楚國，包括吳、越、蔡等國的銅器銘文中的花體字，其春戰之際的界限就更難以掌握了。因此，對戰國文字使用時間的上下限，乃至對一種字體的始末予以探討，只能求其概數，而不宜強指其絕對年代。

基于這種認識，所謂「戰國文字」的上下限應是比較寬的。我們認為如春秋末年的侯馬盟書（或以為戰國初年）以及部分越國、蔡國銅器銘文，都可以與戰國文字對比研究。同理秦統一後的若干銅器銘文和簡牘文字，也可以與戰國文字對比研究。至于時代不宜確指的貨幣、璽印、陶文等材料，我們也間或採用春戰之際和秦統一以後者。這不僅便于文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而且與文字形體「漸變」的規律也是並行不悖的。

總之，我們所討論的「戰國文字」材料並不十分嚴格地局限于歷史上的戰國時期，而間有關入春秋末期和秦統一以後者，大體可以這樣說：古文字學中所謂「戰國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統一以前這段歷史時期內，齊、楚、燕、韓、趙、魏、秦等國曾使用過的一種古文字。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中是上承春秋金文，下啟秦漢篆隸的重要環節。

下面就按古代、近代、現代的時間順序，介紹歷代有關戰國文字出土和研究的概況。

第二節 古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一、兩漢時期

戰國文字材料的首次發現應追溯到二千年前的西漢前期。

漢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詔令廢除秦始皇時的「挾書律」，許多秦火之餘的戰國古籍賴以

保存下來。如：河間人顏貞秘藏《孝經》、北平侯張蒼所獻《左傳》、河間獻王所得《周禮》等相繼發現。不過這一時期轟動一時而又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當首推孔子壁中書的發現。

西漢景武之際，魯恭王在山東曲阜孔子故宅牆壁中意外地獲得一批珍貴的儒家典籍。這些典籍書寫于竹簡之上，其文字與當時通行的隸書截然不同。後來稱這批典籍為「古文經」，其文字為「古文」。其實這是戰國文字的首次大規模發現，遺憾的是這一點有意無意被人們忽視了。「古文經」出現後，立即遭到「今文經」學家的激烈反對。然而也有少數有識之士非常珍視這批新材料，並用以校正當時通行的「今文經」。如：武帝時學者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則「以今文讀之」（《史記·儒林傳》），並「以今讐古，隸篆推科斗」（《孔叢子·與從弟書》）。這顯然是具體而微地整理和研究古文文字。孔安國研究古文《尚書》應是古代研究戰國文字的濫觴。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漢書·劉歆傳》），乃詔劉向「校中五經秘書」（《漢書·劉向傳》）。西漢末年，劉向之子劉歆繼父之業負責整理中祕藏書。他不但建議政府將「古文經」立于學官，而且對「古文經」本身進行研討。不言而喻，他在整理這批「古文」材料時，勢必也和孔安國一樣，對其文字進行釋讀和校理。所謂「釋讀」，是研究任何一種古文文字的先行步驟，也是最基礎的工作。延及東漢，研究「古文經」成為一代風氣。兩漢古文經學家多是古文文字學家，如：張敞、桑欽、爰禮、楊雄、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人均其中翹楚者④。

這一時期，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東漢文字學大師許慎對戰國文字研究的功績。眾所周知，許慎《說文解字》的體例是「叙篆文，合以古籀」（《說文·叙》），所謂「古籀」多是戰國文字的傳鈔材料，今天已成為釋讀出土戰國文字的重要依據（詳第二章）。另外，通過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及其他傳鈔材料的比較，還可以豐富我們對戰國文字形、音、義諸方面的認識。下面試舉幾例說明：

（一）、《說文》：「古文周，从古文及。」「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亦古文及。「關於「周」从「及」，以往學者多有疑惑⑤。檢中山王圓壺銘之「周」作「𠂔」⑥，中山國十四葉鼎銘之「周」作「𠂔」⑦，古文四聲韻《引》《說文》：「周」作「𠂔」。凡此證明戰國文字中的確有从「及」的「周」。當然，「周」何以从「及」，「及」何以省「又」作「人」形⑧，尚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今後的研

究方向應該是用新出土的戰國文字印證許說，而不是否定或懷疑許說。

(二)、《說文》：「因古文席，从石省。」^⑧「因」即「西」^⑨，乃「簞」之古文^⑩。「因」之所从「石」為形符，「尸」乃聲符。「尸」，「石」之省，可參九年衛鼎銘之「席」作「尸」，望山二號楚簡「席」作「席」。《古文四聲韻》還保存着「不省」的「席」作「尸」。席从「石」得聲，聲韻均合。

(三)、《說文》：「斂古文伊，从古文死。」案「斂」，从人死聲。伊、死疊韻。望山一號楚簡之「死」作「斂」^⑪，與《說文》古文契合。

(四)、《說文》：「殳古文役，从人。」又「殳籀文殺」(小徐本)。檢《侯馬盟書》三二六「殺」作「殳」，「殳」等形。兩相比勘知古籀所保存的「殳」實乃戰國古字「殳」之譌體，均應隸定為「殳」。進而也可以論定，楚簡中習見的「殳」、「殳」等形^⑫，則應釋「役」，讀「疫」。

許慎對《說文》古籀的解釋當然未必盡確，有的結論還相當荒謬，如釋「為」之古文「𠂔」字「象兩母猴相對形」云云。然而通觀《說文》有關古文、籀文的解釋，則不難看出許慎對這批不同于小篆的文字相當重視，並進行過深入地研究。他對古籀的形體分析，至今在研究戰國文字中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

總之，兩漢是研究「古文」的鼎盛時期。古文經學家在研究「古文經」的同時，對其文字的形體也進行研討。他們研究的對象「古文」，其實就是戰國文字。可惜由于「古文經」的亡佚，有關著作都未能流傳下來(《說文》除外)。今天已無從了解其研究的詳情。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魏石經的刊立和汲冢竹書的發現，最值得大書特書。

魏石經刊行于魏曹芳正始年間，所以又名魏正始石經，以區別于漢熹平石經。魏石經碑文每字多載古文、篆文、隸書三種字體，所以也名三字石經或三體石經。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的形體十分接近，應是一個系統的文字(詳第二章第三節)。魏石經的刊立對「古文」的傳播和研究起過積極的作用。今天研究「古文」，除了《說文》古文之外，這批材料最為可靠。因此，石經古文也是釋讀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證之一。

這時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以汲冢竹書最為顯赫。西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⑬，今河南汲縣民不準盜掘戰國魏王古墓所得竹簡凡七十五篇，其中包括《周易》、《紀年》、《穆天子傳》、《璣語》等十六種，約十餘萬言。這是繼孔子壁中書之後又一次重大的考古發現。與壁中書不同，汲冢竹書發現之時即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詔令當時著名學者整理這批竹書，寫出「隸古定」釋文。所謂「隸古定」就是把戰國古文寫成今隸，這當然屬於古文字研究範疇，我們今天尚能看到的《古本竹書紀年》佚文和《穆天子傳》，即西晉學者荀勗、和嶠、摯虞、衛恒、東晉等人整理這批竹書的部分結晶。另外，衛恒在整理竹書時通過分析同字異形，歸納為數百條，撰《古文官書》一卷^⑭。續咸撰《汲冢古文釋》十卷。這些都是專門研究古文字的著作，可惜唐宋以後已蕩然無存。

汲冢竹書與三體石經也是同一系統的文字（詳第二章第三節）。西晉學者在整理汲冢竹書時，已有四十年前刊立的石經做為「隸古定」依據，顯然要方便得多。《穆天子傳》不到一年就整理完畢，其他竹書也于永康元年（公元二八一年）全部編校寫定^⑮。杜預曾參考這批新出土的材料為《左傳》作注。凡此說明汲冢竹書的整理速度和研究成果都相當可觀，這與三體石經的刊立和流佈不無關係。

但是也必須指出，《紀年》的體例比較接近石經中的《春秋》，用後者常用的文字與前者戰國古文參讀，其文字障礙不會太多（《紀年》也偶存古字，如「宋景公癸」與宋公癸戈的「癸」同形，《史記》則作「樂」。）然而《穆天子傳》所涉及的人名、地名、草木魚蟲、珍寶異器等文字則相當繁富，遠非石經古文所能囊括。今天能見到的《穆天子傳》雖是隸定本，然猶存古文。如「時」作「皆」（卷一），「壽」作「昌」（卷二），其「作」作「丌」（卷四），「乘」作「樂」（卷六）等均見戰國文字。又如「山隙自出」（卷三）之「隙」乃「陵」之古文^⑯。其右下兩點可從散盤「陵」、長陵盃「陵」得到驗證。又如「左穆」而左白俄」（卷四），郭注「俄古義字」^⑰。參照鄭王詁戈「義」作「箴」（羊、我合書），其上方正从「羊」頭，可以推測，竹書原作「儀」，後隸定為「俄」。類似的「古文」在《穆天子傳》中並不算少，應引起戰國文字研究者充分重視。

另外，南齊高帝時在湖北襄陽古墓中發現《考工記》十餘簡，梁任昉獲《尚書》遺篇殘簡，今均亡佚。

總之，魏晉南朝期間，以三體石經的刊立和汲冢竹書的發現最為重要。這一時期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如衛恒、續咸等人的著作）未能流傳至今，乃是戰國文字研究中的憾事。

三、唐宋元明時期

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收穫是石鼓文和詛楚文的發現。隋唐之際，在秦國故地雍邑發現十枚饅頭狀的石頭，上刻韵文十首，這就是著名的石鼓文。因為石鼓文中有幾個字與《說文》籀文形體吻合，所以長期以來被誤認為周宣王遺物。其實石鼓文乃是戰國秦文字（詳第三章第六節）。北宋中葉也是在秦國故地又發現了詛楚文石刻。石鼓文和詛楚文為研究秦始皇以前的秦國文字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考古材料的發現，往往能開拓人們的視野。以出土文獻驗證傳世文獻的方法，一直被古代學者所運用。眾所熟知，隋初顏之推根據當時出土秦權銘文「乃詔丞相狀縮」，糾正了《史記·秦本紀》「丞相隗林」的「林」是「狀」之譌（《顏氏家訓·書證》）。唐代傅奕根據北齊時發現的《老子》，校訂通行本《道德經》等。

宋代，一些戰國銅器銘文陸續發現。在宋人金石著作裏，戰國銘文尚未能從兩周金文中分離出來，或系屬商代（如者旨於賜鐘），或系屬夏代（如蔡侯產戈）。以今天斷代水平去衡量，其荒誕自不待言。這時重要的金石著作有：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少數戰國銘文在這時被辨識出來。例如，經金石家趙明誠考訂的禽章鐘，至今仍是楚銘文斷代的標準器。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據當時尚能見到的「古文」材料，輯成《汗簡》。其後夏竦又在該書基礎上增補許多「古文」，輯成《古文四聲韻》。這兩部書雖然取材較為龐雜，且時有譌誤，但從保存傳鈔古文材料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往學者對這兩部書的評價甚低，考古新材料已經證明：《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乃是釋讀戰國文字不可缺少的工具書（詳第二章第五節）。

元、明兩代，戰國文字的材料既無重要發現，蒐輯整理方面的工作也鮮有重要成果，故茲從略。

總之，唐代至明代的戰國文字資料所獲不多，蒐輯和整理傳鈔古文則頗有成績，這為今天我們研究戰國文字提供了某些方便條件。

西漢至明這段漫長的歷史歲月裏，出土戰國文字資料的數量和品類都很有限，惟獨竹簡文字資料堪稱大宗。古代學者對孔子壁中書、汲冢竹書等竹簡曾做過許多整理和研究工作。遺憾的是這些成果與竹書原物均已湮沒無聞，經傳注疏的「隸古定」及字書中的「古文」亦並非戰國文字的本來面貌，我們只能從傳鈔古文中得其髣髴。因此，對《說文》古文、籀文、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之類的傳鈔古文資料應倍加珍視。因為古代學者對戰國文字的時代缺乏明確的認識，所以可稱「古代」為「戰國文字研究的蒙昧階段」。

第三節 近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一、出土和研究概況

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正處封建社會學術研究的頂峰階段。在「樸學」風氣的影響下，「小學」的附庸「金石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內府編纂《西清古鑑》，阮元編纂的《積古齋鐘鼎款識》被收入《皇清經解》，均其重要標誌。

晚清以後，出土戰國銘文巨增。較著者有戰國早期田齊標準器——陳侯四器，兵器銘文的數量也遠勝于前代。這一時期金石著作總總林林，其中多載戰國銘文，如吳式芬《攔古錄金文》、吳大澂《憲齋集古錄》、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陶齋吉金錄》等。

降至民國，出土戰國銘文尤富。最重要的收穫是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洛陽金村古墓的發現。墓中所出屬羌鐘是戰國早期的魏國標準器，劉節、唐蘭、郭沫若、徐中舒等學者均有專文考證⁽¹⁸⁾。該墓還出有若干容器和金銀器銘文，則是東周國的標準器⁽¹⁹⁾。金村古墓所出的這批銘文材料，詳見加拿大懷履光《洛陽故城古墓考》⁽²⁰⁾、日本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兩部著作。另一重要收穫是一九三三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有銘銅器三十餘件。其中禽孟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這為戰國晚期楚文字確立了可靠的標尺。唐蘭、郭沫若、胡光燾、劉節等學者均有專文研究⁽²¹⁾。該銅器群留存在國內者，均收入北京歷史博物館編《楚文物展覽圖錄》。其他新出戰國銘文尚多，茲不備述。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是這時集大成的金文總集，其中收錄戰國銘文相當豐富，至今仍

不失為研究戰國兵器銘文的主要資料來源。

晚清以來，傳統金石學迅速地發展，已漸有獨立之勢。學科分類的日趨精密，有利于促進金石學園地裏開拓戰國文字研究的新領域。在戰國文字尚未明確地從舊金石學中分離出來以前，石器、貨幣、璽印、陶器等文字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先行展開。下面就簡單地介紹銅器銘文以外各種文字的研究概況。

石鼓文和詛楚文的研究，在民國期間頗為興旺。郭沫若、馬叙倫、馬衡、唐蘭等學者都參加了石鼓文年代的討論⁽²²⁾。羅振玉、張政娘則通篇考釋石鼓文⁽²³⁾。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書尤為重要。關於詛楚文，容庚、郭沫若均有專著研究⁽²⁴⁾。商承祚《石刻篆文編》，是研究秦漢石刻的工具書。

現存最早的貨幣文字著作是宋代洪遵的《泉志》。那時戰國貨幣尚未被人們所認識。貨幣文字簡易詭異，長期以來被誤認為洪荒飄渺的遠古或夏代的遺物，有太昊、高陽、黃帝幣之說⁽²⁵⁾。自乾嘉古錢學家蔡雲提出「今所見金幣……蓋流行于春秋戰國」⁽²⁶⁾的論斷，歷史上的種種謬說才得以澄清。有清一代古錢學家對戰國貨幣的整理和研究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如：李佐賢《古泉匯》對戰國貨幣出土地點和鑄造歷史的考證，馬昂《貨幣文字考》、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對戰國貨幣文字的辨釋，都各具特色。一九三八年丁福保編纂《古錢大辭典》，幾乎全部收入了當時見于著錄的古錢品種。該書附有釋文及諸家研究成果，甚便學者。與此同時，日本奧平昌洪編成《東亞錢志》。該書除間收不見于舊錢譜的珍品之外，還採用了近人的考釋，頗有參考價值。

璽印文字歷代都有發現，明代已有了印譜，但是比較系統地蒐輯和整理璽印文字則是從清代開始的。與戰國貨幣相反，戰國璽印曾一度被列入秦漢璽印之後。乾嘉著名學者程瑤田首先釋出「口」為「私璽」，並指出「璽但用介者，古文省也」⁽²⁷⁾。程氏把戰國璽印文字歸屬於「古文」，見解十分犀利。後來徐同柏索性把古璽稱為「古文印」⁽²⁸⁾，吳式芬又進一步分出「古璽官印」和「古朱文印」⁽²⁹⁾。同治年間，陳介祺薈萃各家印譜編輯《十鐘山房印舉》，其中古璽材料十分豐富。該書雖兼收漢以下材料，但首列「古璽」，又進而先列官璽，後列私璽，這一體例至今仍在沿用。陳氏還推測「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近两周者⁽³⁰⁾，也頗有見的。光緒年間，吳大澂輯《說文古籀補》。該書雖以收錄

金文為主，但兼收古璽五百七十餘字，釋讀頗為精審。民國時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又對吳氏之書有所補充。嗣後出現許多古璽印譜，較重要者有黃濬《尊古齋古璽集林》、方清霖《周秦古璽菁華》等，一九三〇年羅福頤《古璽文字徵》出版，收錄可識璽文六二九字，是第一部古璽字書，吳幼潛《封泥彙編》收錄十幾方戰國封泥，也是研究璽文的罕見材料。

清同治年間，陳介祺開始鑑定和蒐輯山東濰縣出土的陶文。嗣後山東、河北、河南、陝西等又發現了齊、燕、韓、秦諸國陶文，其中以齊、燕舊地出土量最多。早期研究陶文的學者以陳介祺和吳大澂貢獻最大，但二人的著作多未刊行，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對陶文的考釋只反映他研究的部分成果。民國期間，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均收錄陶文，其考釋也間有可採。後來顧廷龍《古陶文彙錄》不但收錄陶文單字，而且附有辭例，體例更為完備，是當時最權威的陶文工具書。這時幾篇有關陶文研究的論文頗具水平，如：唐蘭考證出陶文「陳向」即典籍之「田常」⁽³¹⁾，張政烺考證陶文「陳得」與陳璋壺、子禾子釜銘文的「陳得」實為一人⁽³²⁾。凡此無疑提高了陶文的史料價值。著錄陶文的著作主要有陳介祺《簠齋藏陶》、劉鶚《鐵雲藏陶》、周進《李木藏陶》等。

一九四二年，在湖南長沙古墓出土的楚帛書，是戰國文字罕見的繚帛文字材料。楚帛書發現不久即流入國外，國內只有不精確的摹本，研究著作有蔡季襄《晚周繚書考證》。

一八八三年，吳大澂草創按《說文》順序收錄古文字的體例，編纂《說文古籀補》。嗣後仿效者有：一九二五年丁佛言編纂的《說文古籀補補》，一九三五年強運開編纂的《說文古籀三補》。這類古文字字典雖以收錄金文為主，但也收錄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戰國銅器、兵器、石器、貨幣、璽印、陶器等文字，這為戰國文字字形的系統整理奠定了基礎。這類字書對戰國文字的釋讀多有可取之處，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王國維的貢獻

在近代戰國文字研究的領域中，王國維所做的貢獻尤其值得我們珍視。眾所周知，王國維是甲骨學問山鼻祖之一，他對銅器銘文也有精邃的見解，同時他在戰國文字的理論建樹和實踐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異的成就。王氏對戰國文字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王國維對戰國文字的宏觀研究，表現在他首先明確地指出「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³³⁾。

他列舉了大量戰國文字與《說文》古文、石經古文形體相合的例證，得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壁中書為一系」的結論⁽³⁴⁾。今天，我們用新出土的六國文字資料與《說文》古文、石經古文相互比較，也完全可以證成王說。

(二)、王國維注意用傳鈔古文材料考釋戰國文字。所舉戰國文字與《說文》古文、石經古文互為印證者四十餘例。除誤釋「頭」為「履」之外，其他所釋之戰國文字均確切無疑⁽³⁵⁾。王氏用同樣的方法研究籀文，也時有創獲⁽³⁶⁾。另外，王氏還有一些關於石經古文和戰國文字的研究論文⁽³⁷⁾。凡此都是王氏對其理論的延伸擴大和具體應用。

(三)、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戰國以後彝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簋及大梁、上官諸鼎，寥寥不過數器」⁽³⁸⁾，然而王氏精譬地指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唯一材料。其為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³⁹⁾這種認識無疑擴大了戰國文字資料的範疇。

六國文字即「古文」，這一命題的提出，從根本上廓清了歷史上對「古文」的種種誤解，意義十分重大。王國維以其理論和實踐擴大了古文字研究者的視野，啟迪後人甚鉅。在近代古文字學界普遍只注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形勢中，王氏的觀點的確是洗人耳目的空谷之音。我們認為，近代戰國文字研究是建築在出土文字資料和對傳世「古文」研究的基礎上而興起的新學科，王國維則是這一學科的奠基人。

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出版，這對兩周金文研究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書對部分戰國銅器銘文，由縱橫兩個方面予以定點：即首先按國別分域，然後再按時代分期。這無疑奠定了戰國銅器銘文斷代和分域的基礎。由於當時資料有限，其編排體例未能盡善盡美，但《大系》堪稱戰國銅器銘文斷代的嚆矢。至今仍然有許多學者按着《大系》的體例，繼續編纂戰國銅器銘文編年。

清代，尤其晚清以來，隨着戰國文字資料的增多，戰國文字已從蒙昧的古代黑暗之中逐漸露出一線曙光。近代學者把戰國文字研究的對象由地上傳鈔「古文」轉向地下出土「古文」。這一時期，王國維的理論研究多有可取；其他學者的蒐輯、整理工作也取得一些成績。然而，當時的戰國文字研究實則剛剛起步，兵器、貨幣、璽印、陶文、石器等銘文的考證頗為零散。從總體來看，上述研究缺乏綜合性的探討。因此，這一時期，可稱之為「戰國文字研究的萌芽階段」。